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第三辑）



秘书学研究论集

MISHUXUE YANJIU LUNJI

杨树森 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第三辑）



秘书学研究论集

MISHUXUE YANJIU LUNJI

杨树森 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 芜湖 ·

责任编辑:刘 佳

装帧设计:丁奕奕 欧阳显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秘书学研究论集 / 杨树森著. —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6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 第三辑)

ISBN 978-7-5676-2676-8

I. ①秘… II. ①杨… III. ①秘书学-文集 IV. ①C931.4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53392号

本书由安徽高校省级学科建设重大项目资助出版

秘书学研究论集

杨树森 著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 <http://www.ahnupress.com/>

发行部: 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印刷: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8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00 mm×1000 mm 1/16

印 张:23.25

字 数:360千字

书 号:ISBN 978-7-5676-2676-8

定 价:69.8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总 序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前身是1928年建立的省立安徽大学中国文学系，是安徽省高校办学历史最悠久的四个院系之一。1945年9月更名为国立安徽大学中文系，1949年12月更名为安徽大学中文系，1954年2月更名为安徽师范学院中文系，1958年更名为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1972年12月更名为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1994年10月更名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这里人才荟萃，刘文典、陈望道、郁达夫、朱湘、苏雪林、周予同、潘重规、宗志黄、张煦侯、卫仲璠、宛敏灏、张涤华、祖保泉、余恕诚等著名学者都曾在此工作过，他们高尚的师德、杰出的学术成就凝固成了我院的优良传统，培养出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各类人才。

文学院现设有汉语言文学、汉语言、秘书学、汉语国际教育等4个本科专业，文学研究所、语言研究所、古籍整理研究所、美育与审美文化研究所、艺术文化学研究中心等5个研究所（中心）。拥有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中国语言文学、艺术学理论两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设有中国古代文学等10个硕士学位二级学科授权点和学科教学（语文）、汉语国际教育两个专业学位点；有1个安徽省A类重点学科（中国语言文学），3个安徽省B类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现当代文学）；1个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汉语言文学专业），1个国家级教学团队（中国古

代文学)，两门国家级精品课程（文学理论、大学语文），1个省级刊物（《学语文》）。

文学院师资科研力量雄厚，现有在岗专任教师82人，其中教授28人，副教授35人，博士55人。2010年以来，本学科共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100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8项（含重大招标项目和重点项目各1项），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9项。教师中，有国家首届教学名师1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2人，皖江学者3人，二级教授8人，5人入选省级学术和技术带头人，6人入选省级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走过八十多年的风雨征程，目前中文学科方向齐全，拥有很多相对稳定、特色鲜明的研究领域。唐诗研究、古代文论研究、儿童语言习得研究、古典文献研究、宋辽金文学研究、词学研究、当代文学现象研究、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梵汉对音研究、句法语义接口研究等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或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特别是李商隐研究的系列成果已成为传世经典，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先生说，本学科的李商隐研究，直接推动了《中国文学史》的改写。

经过几代人的薪火相传，中文学科养成了严谨扎实的学术传统，培育了开拓创新的学术精神，打造了精诚合作的学术团队，形成了理论研究与服务社会相结合、扎根传统与关注当下相结合、立足本位与学科交融相结合、历代书面文献与当代口传文献并重的学科特色。

21世纪以来，随着老一辈学者相继退休，中文学科逐渐进入了新老交替的时期，如何继承、弘扬老一辈学者的学术传统，如何开启中文学科的新篇章，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基于这一初衷，我们特编选了这套丛书，名之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计划做成开放式丛书，一直出版下去。我们认为，对过去的学术成果进行阶段性归纳汇集，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可以向学界整体推介我院的学术研究，展现学术影响力。

现在奉献的是第三辑，文集作者既有年高德劭的退休老师，也有年富力强的年轻学者，学科领域涵盖中国文学、语言学、美学、逻辑学等，大

致可以反映文学院学术研究风貌的历史传承与时代新变。

我们坚信，承载着八十多年的历史积淀，文学院必将向学界奉献更多的学术精品，文学院的各项事业必将走向更悠远的辉煌！

储泰松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

目 录

中国秘书史研究

中国秘书工作起源年代新探	3
孔子编订“六经”对中国古代档案事业的贡献	9
和谐——三大历史盛世秘书班子的共同特征	18
中国古代公文的发展脉络和借鉴价值	23
从地位显赫的史官到纵横天下的“士” ——中国先秦时代秘书制度的演变	37
从尚书台取代御史府到秘书令昙花一现 ——秦汉两代秘书制度的演变	44
从三省制兴盛衰废到翰林院独掌机要 ——魏晋南北朝到元代秘书制度的演变	50
从内阁六科制的确立到书吏之害形成 ——明清两代秘书制度的演变	56
从总统府秘书处设立到文书制度的全面改革 ——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的秘书工作	62
从秘书长频繁变换到文官考试法的颁布 ——北洋军阀政府(1912—1927)的秘书工作	70

从委员长侍从室的设立到文书工作的三次改革	
——南京国民党政府(1927—1949)的秘书工作	78
从“一大”兼职秘书到长征中的中央秘书长	
——从建党初期到抗战之前中国共产党的秘书工作	86
从组建中央办公厅到设立人民政府秘书厅	
——从抗战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的秘书工作	94
从建立各项秘书制度到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从共和国成立到“文革”前我国的秘书工作	102
从田家英被迫害致死到形式主义文风泛滥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的秘书工作	110
从提出“三服务”宗旨到推行公务员制度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秘书工作	117
中国古代的会议和会务工作	125
中国古代的信访工作	131
中国古代的档案工作	137
中国古代的值班工作	144
中国古代的宫廷服务	150
中国古代保密工作和印玺管理	155
中国古代的督查工作	162
中国古代的机要交通工作	169
中国古代的信息工作	176
中国古代的调查研究	183
中国古代的文书处理	190
中国古代的文书撰拟	197
文笔之分的见证人——任昉	203
善于建章立制的秘书长——张廷玉	208

现代秘书理论与秘书工作研究

论我国秘书教育的历史和现状	215
论我国高校秘书专业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222
再论秘书的定义	229
对秘书“两大部类分类法”的理论思考	237
论当前我国秘书的社会地位	245
论我国当前秘书行业的特点	251
论我国秘书机构的设置原则	257
论我国秘书机构的名称	263
论领导	269
论我国当前秘书工作的内容	276
论秘书工作的性质及其对秘书的要求	284
“三服务”是秘书工作的宗旨	
——对秘书工作“三服务”的再思考	290
秘书政治素质谈	298
秘书职业道德谈	303
秘书作风修养谈	309
谈谈秘书工作中的参谋咨询问题	314
试论秘书部门在领导决策中的参谋咨询	320
试论秘书部门在日常工作中的参谋咨询	326
忠言顺耳更利行	
——谈秘书向领导谏诤的艺术	333
有效管理时间	
——“三维综合分类法”例解	337

附录一：《秘书学概论》序言和后记

秘书学研究的新成果

——评杨树森教授的新著《秘书学概论》343

《秘书学概论》后记346

附录二：《秘书实务》序言和后记

创新的《秘书实务》 务实的理论创新

——杨树森教授其书其人349

《秘书实务》后记356

后 记 360



中国秘书工作起源年代新探

中国秘书史研究

中国秘书工作起源年代新探

一、关于中国秘书工作起源的两种不同观点

关于中国历史上秘书工作究竟发端于何时，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秘书工作是随文书的产生而出现的。探讨中国文书的起源，必须紧紧抓住两点：一是中国文字的出现，二是中国阶级社会的出现”。因此，公务文书的出现也就是秘书工作的出现，“不但是在有了文字以后，而且，也总得在有了阶级统治以后才有可能”^①。历史常识告诉我们，中国的阶级社会始于夏代，根据上述观点，中国的秘书工作发端应该是在夏代，也就是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出现以后，距今四千年左右。持这一观点的还有刘登山先生，他直接指出“秘书工作最早则起源于夏代的奴隶社会”^②。

第二种观点认为，“秘书工作的产生必须具有两个条件：文字和有领导部门的社会组织”。根据这两个条件，“可以推断，从广义的范围来说，我国的秘书工作起源于部落联盟的昌盛时期，即黄帝至禹时期，约距今四千五百年至四千一百年之间；从狭义的范围而论，它起源于黄帝时期，即距今约四

① 李欣等：《中国现代秘书工作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9页。

② 刘登山：《秘书学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

千五百年至四千四百年之间的龙山文化晚期，最迟当启端于尧舜时期”^①。

二、文字的出现不是秘书工作产生的前提条件

上述两种观点都把文字出现作为秘书工作产生的前提条件。笔者认为，即使秘书工作可能产生于文字出现以后，但从理论上说文字的出现并不是秘书工作产生的前提条件。

把文字的出现作为秘书工作产生的前提，是基于这样一个推论：公务文书就是公务活动中产生的文字材料，有了文字才会有公务文书；有了公务文书才会有撰写、处理和保管公务文书的秘书人员，才会有秘书工作。这一推论的一个隐含前提是：秘书工作就是有关公务文书的工作，没有文书工作也就不会有秘书工作。这一前提是不符合现代秘书学观点的。

现代秘书学认为，秘书是为领导或雇主“提供辅助管理、综合服务的人员”^②，秘书工作的范围是非常广的。按照《中国现代秘书工作基础》的解释，党政机关秘书工作是“以为领导者的工作运转和决策服务为宗旨，在办文、办会、办事等方面从事参谋性、助理性工作”^③。“办文、办会、办事”这三个主要方面，只有办文一项是以公务文书为工作对象，其他两方面虽然也会用到文书，但文书只是作为一种工具或必然产生的结果（现代社会有哪一项工作能脱离文书呢）。

根据我们对我国各级各类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办公室所承担的实际工作的调查，秘书工作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1）政务性工作，即直接为领导决策服务的综合性的工作，包括调查研究、信息工作、协调工作、督查工作等；（2）业务性工作，即秘书部门承担的带有专业性质的工作，包括文书工作（公文撰写和文书处理）、档案工作、资料工作、会务工作、谈判事务、信访工作、公关工作、保密工作等；（3）秘书部门承担

① 杨剑宇：《中国秘书史》，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20页。

② 陈合宜：《秘书学》，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

③ 李欣等：《中国现代秘书工作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页。

的一些机关具体事务，包括接待工作、通信工作、印信管理、值班事务、机关后勤管理、领导日程的安排等。以上列举的具体工作有近20项，而其中只有文书工作和档案工作是以公务文书为工作对象的。因此，尽管文书档案工作是秘书部门诸项业务中占有相当大比重的工作，但秘书工作的范围则远远大于文书档案工作的范围。由此可见，文字的出现只是文书档案工作产生的必要条件，而不能笼统地说它是秘书工作产生的必要条件。

关于文字或公务文书的出现不是秘书工作产生的前提条件，这里还有两个旁证：

第一，我国古代的契丹族，自公元4世纪起即活跃于北方，其社会发展阶段处于原始社会后期，到7世纪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部落联盟，9世纪末进入奴隶制社会，916年，原来的部落联盟首领阿保机称帝建立辽国，而直到这时，契丹族仍然没有文字，“刻木契记事”。920年，阿保机才命从侄鲁不古和突吕不创制契丹文字。而在这之前，契丹族部落联盟管理活动和建国过程中，早已有了秘书工作。与此类似，北方女真族在1115年建立奴隶主国家“大金”之后，才创造出女真文字。^①

第二，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有的社会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少数民族也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阶段，或奴隶社会阶段。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字，也不使用汉字，其部落内部进行管理并不使用公务文书，但其首领（酋长）却配助手，这些助手帮助酋长做一些收集信息、传达命令、筹备集会和对外联络等工作，这些工作显然具有秘书工作的性质。

三、秘书工作产生的条件——社会组织领导人或领导集团的出现

秘书工作既然只能定义为“以为领导者的工作运转和决策服务为宗旨的参谋性、助理性工作”，从理论上说，当社会组织发展到一定规模并形成相对稳定的领导人或领导集团的时候，为这些领导提供“参谋性、助理

^① 参见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六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243—245页。

性”服务的秘书工作也就随之出现了，而不管这时是否已经有了文字和公务文书。因此，社会组织领导人和领导集团的出现，既是秘书工作产生的必要条件，也是秘书工作产生的充分条件。

下面我们就来考察秘书工作产生的这一条件产生的时间。

考古发掘证明我国最早的人类祖先距今有二百多万年的历史。最早的人类是以原始人群的方式生活的，虽然原始人群已经是一种社会组织，但其组织结构极其简单，没有形成发号施令的领导者或领导集团，因此不具备秘书工作产生的条件。

经过漫长而缓慢的发展，到原始社会后期，逐渐形成了以血统关系结成的稳定的社会基本经济单位——氏族。氏族组织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又出现了若干血缘相近的氏族联合而成的胞族，若干胞族组成更大的社会组织部落，部落由两个以上血缘相近的胞族或氏族构成，它通常有自己的地域、名称、方言、宗教、习俗，并形成了管理公共事务的机构和部落首领。我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农氏、有巢氏、伏羲氏、燧人氏等就是这样一些部落首领。

到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华夏土地上又出现了若干部落联合而成的部落联盟，当时黄帝是中原最大部落联盟的首领，在黄河上游有以炎帝为首领的羌人部落联盟，在南方长江流域则有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族部落联盟。根据这些传说，一个部落联盟所居住的区域是很大的，大的部落联盟的居住区超过现在的一个省。

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的管理实行原始民主制，凡遇重大事务，由氏族全体成员、氏族族长或部落酋长议事会讨论决定，而氏族族长、部落酋长、部落联盟首领，均需分别经过其成员推举产生。

传说中的部落联盟有时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如黄帝部落与炎帝部落曾联合发动了征服南方蚩尤部落的战争，后来黄帝部落又征服了炎帝部落，人们拥戴黄帝为“天子”，年号称轩辕，定都涿鹿，各部落表示服从命令。部落联盟除组织共同的军事行动外，还具有加强部落间经济、文化联系等职能。由此可见，部落联盟组织是一个很大区域的最高行政组织，

内部有相当严密的管理系统，不然就无法解释它能够发动指挥大规模的战争行动。据传黄帝设置了分管各项工作的官职——“六相”，组成了部落联盟的领导集团，而黄帝就是这一领导集团的核心。

以上是我国历史上社会组织领导人和领导集团产生的大致过程。据此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四、关于我国秘书工作起源年代的推断

在以黄帝为首的这样颇具规模的管理系统中，需要有提供“参谋性、助理性”的秘书工作，应该说是没有疑义的。古籍记载，黄帝不仅设立了分管各项事务的“六相”，而且设置了专门的“秘书官”——史官，他们有名有姓，如仓颉、沮诵、孔甲等均当过黄帝的史官。由此可见，黄帝时期就有了名副其实的秘书工作，因此以上所引第一种观点“我国古代秘书工作产生于夏代的奴隶社会”是可以排除的。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否根据以上材料就断定我国秘书工作起源于黄帝时期呢？或者说在黄帝之前就没有秘书工作呢？

有的秘书史读本在论述黄帝前没有秘书工作时写道：在黄帝之前，“一个氏族集中居住于一个村落，地域小，人口少，公共事务简单，凡交流情况，互通信息，通过交谈即能办到，如需决定重要问题，往往在村落中央的公共房屋中商议而定。首领运用口语即能了解情况、表示意见、发出指令，这些意见、指令即能很快传遍全氏族。所以，这时的管理工作中对公务文书的要求尚不迫切，秘书工作也未产生，《淮南子·汜论训》就云：‘神农无制令而民从。’”^①

这段文字所描述的氏族首领实施领导的确无需秘书提供“辅助管理”，但这只限于一个氏族的管理，其管理范围不超过现在的一个自然村。但是，在黄帝为首领的部落联盟形成之前，早已出现了若干氏族组成的“胞

^① 李欣主编：《中国秘书发展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